

「六、四」事件後中共外交政策的趨勢

葉伯棠

內政是外交的延長，任何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往往受到一國內政的影響，共產制度的國家是如此，西方民主國家也不例外(1)。自從中共建立政權以後，「六、四」天安門(後簡稱爲「六、四」事件)大屠殺是中共政權四十年來一次重大事件，也是中共外交政策一個重要的階段。在「六、四」之前，中共是執行「全方位外交」(Equal-Distance Foreign Policy)，在和平共處五原則的口號之下，繼續發展與民主工業國家的經貿關係，並全面改善與共黨國家的外交政策。「六、四」事件以後，以美國爲主的民主工業國家對中共實施不同程度的經濟制裁，使中共經貿外交遭到重大的打擊，而東歐國家的劇變，社會主義陣營突然在世界上消失，使中共受到東西雙方的挾擊，祇有繼續維持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以突破孤立的困境。

對當前國際情勢的基本看法

任何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也受到國際情勢發展的影響，尤其是中共的外交政策受到毛澤東「矛盾論」的影響，從國際矛盾的觀點來制訂外交政策(2)。故國際關係的發展深深地影響到中共的外交政策。

中共對當前國際關係的看法，認爲當前東西雙方關係趨於緩和。中共外長錢其琛指出，從總體來看，戰爭因素雖然存在，但已經日趨減弱，和平因素繼續在增與，唯超級大國雙方對抗的緩和並不等於國際形勢的穩定，導致動盪的各種因素並未消除，在一定的條件下，世界上某些地區仍然會出現動盪的情勢。東歐劇變對歐洲局勢和國際關係總格局將產生深遠的影響。同時，南北經濟差距繼續擴大，造成富國愈富，窮國愈窮的現象，對世界和平與穩定非常不利(3)。

繼續執行經貿外交。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當時擔任總書記的胡耀邦和總理趙紫陽提出「經濟外交」後(4)，運用外交發展與工業國家經貿關係是一項重要政策。現在中共仍然實施「全面開放」政策，「既對資本主義國家開放，也向社會主義國家開放，既對發達國家開放，也向發展中國家開放。」(5)在全面開放的政策下，中共與西方國家經濟合作，引進科技與設備，吸收外國投資，對蘇聯和東歐國家以物易物的經貿關係，與開發中國家展開了合資經營、承包工程和補償貿易等多種形式的經貿關係(6)。

中共外交政策意識型態重大的轉變，就是提出「和平演變」的說法，批評西方國家對中共實施制裁。「六、四」事件後

，中共大事批評西方國家對中共實施「和平演變」。所謂「和平演變」，就是利用和平的手段來消滅社會主義制度。依中共的看法，由於社會主義國家在改革和發展過程中遭遇的困難，現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盛行的論調，是社會主義已經徹底破產，資本主義可以不戰而勝。資本主義國家運用政治、經濟和文化作為手段，促使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的「歷史性機會」。

依照中共的看法，西方國家推動「和平演變」是多方面的：美國標榜自由、民主、人權和價值觀念，實是推行「和平演變」的武器，以期實行「經濟市場化」、「政治多元化」的全盤西化的社會(7)。而西方國家也利用投資、貿易與提供經濟貸款，促成經濟市場化。同樣地，美國也透過文化交往的渠道，宣揚「資產階級」的意識型態，推行和平演變戰略(8)。

中(共)蘇關係處於微妙階段

「六、四」事件以前，中共外交政策的重點之一，就是全力改善與蘇聯的外交關係，實現關係正常化。自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八日，當時擔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的戈巴契夫(Mikhaïl Gorbatchev)在海參威表示，為了實現雙方關係正常化，他願意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與鄧小平會晤。經過多年來的努力和安排，雙方對於高峯會議的內容和行程，以及關係正常化達成原則性的協議(9)。去(一九八九)年六月，戈巴契夫接受鄧小平的邀請

，訪問中國大陸，完成關係正常化的任務。

中共與蘇聯在新的基礎上建立關係。經過這次會談，中共外長錢其琛指出，雙方基於下列基礎改善關係：一、雙方都有改善關係的誠意與進展。二、當前國際形勢出現對話代替對抗，同時雙方都進行改革和建設工作，雙方關係正常化是符合雙方利益的。三、中共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新的歷史條件之下，雙方應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的睦鄰關係，建立平等互利基礎上的經濟關係(10)。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M. Shevardnadze)指出，一、雙方應透過對話的方式改善雙方的關係。二、在遵守互相尊重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平等、不干涉內政、彼此尊重對方的利益、觀點、經驗和實踐等原則的氣氛，保持兩國邊界的和平與安寧。三、雙方關係以當代現實利益為基礎。四、雙方關係的發展「不會也不應該對兩國同第三國、盟國和朋友之間的關係設置障礙。」(11)

雙方外長上述的談話，祇是重申過去的建立，唯從錢其琛的談話中可以看出他是強調「平等互利的經濟關係」(12)。蘇聯副外長羅高壽(Igor Rogachev)表示，蘇聯將與中共建立於和平共處、睦鄰、友好合作原則的新關係。這種關係既不是一九五〇年代的同盟關係，也不是六〇年代和七〇年代的對抗關係，而是在「和平共處五原則」和「社會主義國家四項原則」之下作為關係正常化的基礎，恢復了黨與黨的關係，結束了為期長達卅年意識型態

對抗的局面。

「六、四」事件後，中共積極改善與蘇聯的貿易關係，要求蘇聯拓展與中國大陸的貿易。六月十二日，田紀雲在會晤蘇聯駐北平大使楚揚納夫斯基(Oley Troyanovsky)時，希望蘇聯對中共增加貸款。接著在七月下旬，田紀雲訪問莫斯科並與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馬斯羅可夫(Yuri Marilkov)舉行雙方經濟合作第四次會議，然而雙方貿易並無顯著的增加。

從長遠的觀點來看，中共與蘇聯的貿易深具潛力，中(共)蘇雙方都在邊境改善交通設施，去年八月雙方相互開放五個港口和一條鐵路(13)。從雙方貿易來看，去年雙方貿易額將達卅二億六千萬美元，為中共的第五大貿易國，比前年增長百分之十七。最值得注意的是雙方正在加緊修建一條從蘇聯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鐵路。從文化交流來看，中共逐年增派留學生前往蘇聯，去年中共派遣六百名留學生赴蘇聯深造。據報導，去年十一月中共在黑龍江省哈爾濱市舉行「北部對外貿易展」，以增加與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14)。

「六、四」事件後，蘇聯對中共也作了適度的反應。當民主工業國家拒絕與中共高層層接觸時，去年九月廿一日，蘇聯派遣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第一副主席盧基揚諾夫(Anatoly Lakyarov)訪問中國大陸；十月，蘇聯又派遣「蘇中友協」副會長阿爾希波夫(M. Arhipov)訪問大陸。

東歐劇變後，中共又批評戈巴契夫思想。中共雖然積極改善與蘇聯的關係，但對戈巴契夫所提出的「新思維」(New Thinking)，主張政治要「公開性」和「民主化」極為不滿。尤其是戈巴契夫所提的「重建」(Perestroika)一詞簡直是等於革命，對蘇聯社會經濟產生劇烈的轉變⁽¹³⁾。這種思想是東歐民主化的原動力，也鼓勵東歐民主化的開展。去年七月，戈巴契夫在巴黎宣告不干涉東歐各國內政，鼓舞東歐各國人民爭取民主運動⁽¹⁴⁾。當去年九月東德民主運動初起之時，東德共黨頭目何內克有意師法中共，決定要採取暴力鎮壓，由於受到戈巴契夫的反對而作罷，因而使東德情勢發展到不可收拾⁽¹⁵⁾。去年十二月，羅馬尼亞人民抗暴運動初起，軍人與愛國陣線聯合，與希奧塞古(Micole Ceausescu)的安全部隊相持不下，蘇聯却表示支持「愛國陣線」，導致希奧塞古遭到處決的命運。中共認為東歐情勢的演變如此快，戈巴契夫要負主要的責任，故批評戈巴契夫的改革理論是一種修正主義，使中共在意識型態與實際外交關係上出現非常微妙與矛盾的時刻⁽¹⁶⁾。

東歐情勢突變對中共的衝擊

東歐各國對「六、四」事件的反應非常紛歧。匈牙利和波蘭由於忙於本國的改革計劃，無暇注意中國大陸的情勢，南斯拉夫則漸漸疏遠與中共的關係，祇有羅馬尼亞和東德支持中共屠殺人民之舉。尤其是東德何內克於去年七

月和九月，分別派遣政治局委員兼東柏林市長薛包斯基(Gunter Scharborski)和政治局委員兼副總理克倫茨(Egon Krenz)訪問中國大陸，受到中共的讚揚。江澤民表示，東德是東歐集團中第一個站出來「鮮明地支持中國」的國家。⁽¹⁷⁾足見中共是如何感激東德對它的支持。

從目前東德情勢的發展來看，今後何去何從仍無定論，唯共產組織解體，共產政府改組已為不爭之事實。一九五〇年和六〇年代所謂「社會主義陣營」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中共勢必重新檢討與東歐各國的關係，基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共仍然設法保持與東歐各國政府之間的關係⁽¹⁸⁾。鑒於東歐各國民主浪潮洶湧，中共與東歐之間的文化與資訊交換，必將受到嚴格的控制。

東歐劇變使中共經濟外交又遭到挫折。一九八六年中期，中共發展與東歐的關係，就是採取以物易物的方式，作為與東歐各國的經濟關係。一九八六年，李鵬訪問東歐，分別與東歐各國簽訂五年(一九八六—一九九〇)長期貿易協定。目前東歐實行民主改革與西歐關係急速改變，東、西歐之間的經貿關係亦隨著改善，使西歐各國的注意力轉向東歐，不再重視「大陸市場」。同樣情形，東歐各國轉求與西歐共市的合作，與中國大陸的經貿關係也隨著淡化，使中共經貿外交遭到重大的挫折。

中共與美國關係日漸惡化

「六、四」事件是中共與美國關係的一個轉捩點。在「六、四」事件之前，布希(George Bush)政府極力改善與中共的關係。去年二月，在布希接任美國總統不到一個月，即趁參加日皇喪禮之機前往北平訪問，足見他是如何地重視與中共的關係，嗣後因布希邀請方勵之參加答謝宴會，中共警察攔阻於先，中共又抗議於後，使雙方關係投下了陰影。「六、四」事件爆發後，布希總統因受到美國國會和輿論強烈的譴責，迫於情勢，不得不採取行動制裁中共行動，停止雙方國務次卿以上官員的接觸，停止出售軍事科技和文化交流，並且凍結世界銀行貸款⁽¹⁹⁾。接著，美國參、眾兩院通過對中共實施經濟制裁，一時之間，雙方關係處於凍結的狀態。

「六、四」事件之後，中共與美國的關係大致可以說是以公開的指責和秘密的接觸維持巧妙的關係。中共對敵鬥爭一向是遵循針鋒相對的原則，在布希總統宣佈對中共制裁以後，中共外交部表示不怕外國對中共實施經濟制裁⁽²⁰⁾。並且指責美國干涉中國內政⁽²¹⁾。中共批評美國政府和美國之音對「六、四」事件表現「煽風點火，撥弄是非，唯恐中國不亂」⁽²²⁾。又指責「美國之音」依照美國制訂的政策，「喋喋不休地製造各種聾人聽聞的謊言，自欺欺人」⁽²³⁾。中共也對美國駐北平大使館庇護方勵之夫婦一事指責，認為這是違反國際法侵權行為，要求美國不要干涉中國內政⁽²⁴⁾。

布希政府無意與中共關係惡化，祇因為在

「六、四」事件過程中，美國輿論界大量報導天安門事件發展的過程，尤其不滿共軍屠殺學生和平民，國會議員為順應民意，祇好要求美國政府對中共實施制裁。布希總統在輿論與國會變重的壓力下，迫於情勢，不得不對中共施予壓力。然而布希政府也採取補償的措施，不使雙方關係破裂。六月中旬，布希總統批准四架波音七五七民航機交予中共，理由是這四架民航機不是軍事武器，對中共的制裁不應影響中國人民。其實這四架民航機早在「六、四」事件之前，即已批准。至去年十二月，布希政府同意對中國大陸出口三枚衛星，並撤銷美國對中共生意往來的融資的禁令。

布希政府也設法保持與中共的秘密接觸。布希在表面上雖然對中共實施經濟制裁，但去年七月，又秘密派遣國家安全顧問史考克羅（Brent Scowcroft）和副國務卿伊戈柏格（Lawrence S. Eagleburger）訪問北平，與中共秘密接觸，期求與中共妥協。布希政府這一錯誤的行為，不是迫使中共屈服於美國的經濟制裁，反而有鼓勵中共反美的意識，這種行為是犯了嚴重的錯誤。

中共對美的態度搖擺不定

美國與中共關係的惡化。美國對中共的經濟制裁，連帶使旅遊事業和雙方學術交流完全停止。中共一再指責美國利用學術交流從事情報工作，也是執行和平演變的策略之一。這項指責必然影響雙方學術的交往。從短期來看

，旅遊事業的衰退和貿易的下降，對中共產生直接的影響，尤其是旅遊事業的蕭條，出現立竿見影的效果，對中共的打擊相當的大。中共迫於情勢，其態度不得不轉向軟弱。去年十一月李鵬在巴基斯坦訪問期間，於記者招待會中表示願意改善與美國的關係。待美國前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訪問大陸與鄧小平會談時，鄧的態度又轉趨強硬，要求美國採取主動改善與中共的關係，強調不允許任何國家干涉中國內政。使布希政府的處境頗為尷尬。

美國仍然是中共外交列為最重要的國家，也是在大陸最大的投資國和第三大貿易伙伴。根據去年七月的統計，美國在中國大陸投資的項目已有六百六十個，資金高達卅三億美元，中國大陸成為美國第十三大貿易伙伴，現行中共的留學生已達四萬人。

美國與中共的外交關係存有三大問題，這些問題必將影響到今後雙方關係的發展：第一、美國國會對中共的敵視。布希政府一直主張與中共妥協，不願使雙方關係繼續惡化，但美國國會堅持對中共實施經濟制裁。此一法案雖然遭到了布希總統的擱置，未能通過。接著眾院又在去年十一月通過「中國大陸移民緊急救濟法案」，准許中國大陸留美學生長期居留美國。此事雖未經參院的通過，但布希表示將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來執行，使該項法案不成為法律。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去年十一月和今年一月，美國參、眾兩院又通過「國務院授權法

」，對中共實施經濟制裁，引起中共強烈的不滿。美國是個民主國家，任何法案都需要經過國會通過才生效，國會敵視中共，使中共與美國之間的關係增設了一道障礙。

第二、如何處置方勵之夫婦成為雙方棘手的问题。美國駐北平大使館庇護方勵之夫婦，引起中共強烈的不滿；而方勵之公然批評鄧小平，又因赴宴事件，使美國新聞界的焦點集中在他一人身上，引起鄧小平的反感與痛惡可想而知。現在美國公然庇護他們夫婦，當然給予鄧小平極大的難堪，中共要求美國放人，但美國政府基於人道主義，拒絕中共的要求，繼續庇護他們，這件事情如不能滿意地解決，使雙方關係始終存在一個陰影。

第三、國際變局對雙方關係的影響。過去美國倡導與中共具有平行戰略利益，積極拉攏中共對抗蘇聯，即所謂的「玩中共牌」。現在美國與蘇聯之間的關係已全面改善，兩集團的對抗亦不存在，三角關係的格局已經消失，使中共在美國的戰略地位大大地降低，反而美國突出大陸人權問題，最近美國國務院公佈大陸人權狀況惡劣，使雙方關係的發展必然趨向低潮。

與西歐各國關係日趨冷淡

「六、四」事件使中共與西歐和共市的關係處於空前的低潮。「六、四」事件中，西歐各國對中共公然以現代化的武器屠殺學生，皆難以置信，憤慨異常。為了制裁中共領導人的非人道行為，六月廿七日西歐共同市場十二個

國家在馬德里舉行外長會議，宣佈對中共實施八項制裁，包括停止軍事合作及武器的銷售，暫停新的合作計畫，減少文化科技合作，建議歐洲委員會暫停對中國大陸保險信貸及世界銀行對中共的貸款⁶⁴。西歐國家這一政策性的宣言，使中共與西歐國家的關係陷入凍結狀態。

西歐和共市各國與中共的經貿關係一向密切，雙邊貿易總額遠遠超過其他國家，尤其是西德對中共更是大力援助。現在因為「六、四」事件使雙方關係改變，對於中共的經濟遭到極大的打擊。中共與西歐各國外交關係的冷卻，又受到東歐情勢發展的影響。去年東歐局勢突變，使西歐各國把注意力轉向東歐，尤其是東西德的統一成為西德人民焦點所在，西歐企業界思索如何在東歐投資，把「大陸市場」的觀念早已拋到九霄雲外。

中共對歐洲共市的經濟制裁，從意識形態上反擊。中共無力對共市各國提出反制的措施，祇有運用意識形態的方式，重提以和平共處五原則繼續發展與各國的關係的。「人民日報」強調：國際關係中不干涉原則，已為聯合國所承認，現在西方民主工業國家以維護人權作藉口，干涉別國的政治，試圖改變中共的社會制度，中共堅決反對外國干涉中國內政。依照「人民日報」從法理的立場為自己的行為辯護，它強調以「不干涉內政原則作為一項國際關係和國際法的基本原則，適用於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和國際法的一切領域。」（個人）人格的國際保護要具體通過各國的國內立法、司法

和行政來實現，個人的權利和自由主要是由各國憲法和不同法律規定和保障實施的，任何國家無權對別國立法、司法等權利進行干預。」⁶⁶中共想以國際法的原則來掩護其暴力統治，實則人權是法律的基礎，已為國際間所共識，如果違反人權原則或缺乏人道主義，必為各國所譴責。

運用經貿手段，企圖恢復與各國的關係。「六、四」事件後，中共一再強調繼續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但並未受到各國的重視，它祇好另闢蹊徑，企圖打開僵局。去年七月中旬，中共在北平舉行國際展覽中心開幕，民主工業國家根本沒有派人參加，使中共大失所望。十月初，中共又以「中國國際開發投資公司」名義舉辦「中外經濟合作研討會」，邀請外國企業家參加，希望藉此設法與西方國家和日本等國恢復經貿關係，但收效不大。

與日本關係有待進一步發展

「六、四」事件也影響到日本與中共的關係。不論從地緣關係或貿易的關係來看，中共都非常重視與日本之間的貿易與發展，日本也是中國大陸的第一貿易大國。中共政權常藉政治理由，如光華寮事件、教科書問題和靖國社事件等問題，向日本政府獲取經濟上的利益。去年四月李鵬訪問日本，雙方在求大同存小異的原則下，日本初步同意對中共實行第三次貸款。迨「六、四事件」爆發後，日本迫隨美國和西方國家對中共實施經濟制裁，使雙方關係

急轉直下。唯日本自始並不主張孤立中共，認為它將不利於亞洲地區的和平。中共在遭到西方國家的制裁後，亟需日本的援助來解決資金不足的問題，但日本因中共並未宣告撤銷戒嚴令，使其對中共的貸款顧慮多端。

日未政府試圖改善與中共的關係未果。日本政府非常了解中共的意圖，去年九月中旬，日本政府派遣前外相伊東正義訪問北平，其目的是欲了解「六、四」事件後中共的態度。沒有想到的是，鄧小平在與其談話時，指責七國高峯會議對中共制裁是干涉中國的內政，制裁的結果使制裁者本身將會遭到損失，其態度甚為驕狂，使雙方關係無法突破。在伊東正義的訪問失敗以後，十一月下旬日本企業界代表團由櫻內義雄（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會長）及「日中經濟協會」率領訪問大陸，繼續評估中國大陸的經濟情勢。日本方面發現大陸經濟情勢日趨惡化，卅萬家以上的公營企業經營出現虧損現象，財政補貼高達四五〇億元（人民幣），補貼糧食煤炭等物資高達三六〇億元，加上觀光事業急速衰退，經濟政策混亂，使得人心惶惶，中共經濟呈現衰退跡象，對中共經濟改革缺乏信心。同時日本企業家也有從大陸撤退的行動，因此對中共第三批貸款的態度頗為謹慎。

中共與日本的關係將全面轉好。中共亟欲爭取日本第三批的貸款，但日本始終持觀望的姿態。去年十一月，布希總統派特使訪問中國大陸的消息曝光以後，日本受到極大的衝擊，

一時之間輿論大嘩，積極採取重要步驟設法改善與中共的關係，並決定恢復雙方高級官員接觸的步驟。今年一月中旬，日本政府邀請中共「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鄒家華訪問，並優先考慮第三批的貸款。同時還內定政界重臣安倍晉太郎以日本政府特使的身份訪問，全面恢復雙方關係⁽⁷⁾。

加強與第三世界國家的交往

「六、四」事件之後，中共與西方各國的外交關係陷於停滯狀態。去年九月，東歐民主改革愈來愈激烈，中共對東歐國家情勢的發展憂心忡忡，使中共外交活動的空間大為縮小，故中共不得不發展與第三世界各國的關係，唯其外交活動集中在非洲南部、中東地區和南亞地區。

去年錢其琛非洲南部之行爲「六、四」事件辯護。去年八月，中共外長錢其琛訪問南部非洲六個前總國家（即波黎那瓦、賴索托、津巴布韋、安哥拉、贊比亞和莫三鼻克）。他訪問這些國家除了站在中共的立場爲「六、四」事件辯護外，並且指責西方國家根據錯誤的報導對中共產生誤解。他甚至大言不慚地說，中共與一百卅七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祇有廿個國家對天安門事件持不同的看法，絕大多數的第三世界和社會主義國家都未批評中共屠殺人民的行動，中共決不怕外國的譴責，也不理會西方民主工業國家的經濟制裁⁽⁸⁾。

他這次的訪問也設法爭取南部非洲國家的

友誼，發表解決非洲問題的四點基本立場，鼓勵和支持非洲黑人繼續與南非政府鬥爭，要求南非政府放棄種族隔離政策，並且主張依照聯合國安理會四三三號決議案，解決納米比亞獨立問題。⁽⁹⁾

「六、四」事件後，中共在中東地區的外交活動頗爲頻繁。九月中旬，錢其琛赴聯合國開會之便，前往中東四國（約旦、埃及、敘利亞和突尼斯）訪問，除表示支持阿拉伯國家對巴勒斯坦的立場外，並批評以色列的政策及向各國解釋天安門事件。錢其琛在參加聯合國大會返回途中，又訪問了德黑蘭，並向伊朗政府解釋天安門事件。去年十一月月上旬，中共邀請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拉法特訪問中國大陸，並以國家元首之禮接待。李鵬宣佈中共對中東和平的五點主張⁽¹⁰⁾，十二月「國家主席」楊尚崑訪問埃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科威特和阿曼四國。

其次，中共也派員訪問南亞地區。去年十月，「國務院副總理」吳學謙訪問印度，十一月，「總理」李鵬訪問巴基斯坦、孟加拉和尼泊爾。中共爲了維持與南亞各國的關係，在其經濟極端困難之際，仍然對南亞國家實施經濟援助⁽¹¹⁾。

目前中共的外交活動，祇能說是過渡時期的外交。從中共強調繼續對外開放，大陸各省「國營」企業以「創匯」爲企業的目的，所謂「創匯」就是加強對外輸出，賺取外匯。基於這一目標，中共外交的重心仍集中在改善與民

主工業國家的關係，這是中共一再宣告繼續執行對外開放的原因⁽¹²⁾。再從經濟外交的觀點來看，中共在第三世界的外交重點集中於和東協各國的關係上⁽¹³⁾。同時，中共也設法儘早恢復與印尼的外交關係。如果印尼的關係一旦恢復，整個東協國家的關係也將全面改善。

結論

一九八九年是世界歷史上一個重要的階段，而「六、四」事件在中共外交史上更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六、四事件」連帶地引發了東歐劇變，使東、西雙方對抗緩和，冷戰結束，也使中共外交關係受到影響，三角關係既已消失，中共既不能玩「蘇聯牌」，也不能玩「美國牌」。目前中共仍繼續維持與第三世界國家的交往，但這祇是暫時性的措施，一旦中共與美國或西方國家關係改善，中共勢必冷卻與第三世界的關係。至於蘇聯在戈巴契夫大力的推動下，實施政治改革，以及東歐共黨政權的消失，使中共不得不調整與東歐各國的關係。由於「六、四」事件所引發國際關係全面的變化，對中共政權極大不利，中共如果不能謹慎應付，外因激發內變，益將使中共政權不安，這是中共當前所面臨最大的難題。

註釋

⁽¹⁾ Charles W. Kegley, Jr. and Eugene R. Wittkopf,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8) Chapter II, James

- N. Rosenau,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1), Chapter II.
- 2 J. D. Armstrong, Revolutionary Diplomacy: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the United Front Doctrin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p. 24-35
3. 瞭望週刊海外版，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廿五日。
4.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5. 同註三。
6. 同上。
7. 梅鵬：「看看西方『和平演變』的圖謀」，半月談，一九八九年第十九期，頁五九。
8. 「西方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自白」，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八九年八月八日。
9.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9, 1986.
10.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四日
11. 同上
12. 同上
13. 中共與蘇聯為發展雙方邊境貿易，在遠東地區各由雙方開放了五個港口和一條鐵路口岸線。中共對蘇聯開放的五個港口是同江港、黑河港、哈爾濱港、佳木斯港、富錦港和綏芬河鐵路口岸線。蘇聯向中共開放的港口和鐵路口岸線是卡列寧斯潤耶港、布拉戈維申斯克港、哈巴羅夫斯克港、共青城港、白雅拉柯夫港和格其寨鐵路口岸線。見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八九年八月廿九日。
14. 去年中共在黑龍江舉行貿易展覽，旨在增加對蘇聯貿易輸出。
15. Mikhail Gorbachev, Perestroika: New Thinking for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7), pp. 49-51.
16. Jackson Diehl, "Bloc Tests Limits on Another Spring". Washington Post, August 23, 1989.
17. "How Chinese Solution Was Averted"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 20, 1989
18. 中央日報(台北)。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卅一日。
19. 見「共匪廣播輯要」(台北)，民國七十八年九月廿七日。
20. 參見拙著「東歐變局對中共的衝擊」，中國大陸研究，第卅二卷九期，第七頁。
21.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6, 1989
22. 人民日報，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七日。
23. 人民日報，一九八九年六月廿三日。
24. 吳戈：「『美國之音』的表演與『和平演變』策略」，人民日報，一九八九年七月九日。
25. 王明哲：「正告美國政府和美國之音」，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八日。
26. 富學哲：「美國使館庇護方勵之李淑嫻違反國際法」，人民日報，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一日。陳為典：「美國駐華使館庇護方勵之、李淑嫻是違反國際法的侵略行爲」，人民日報，一九八九年六月八日。
27. Bennis Whiteley, "Bush Face Revolt Over Aircraft Deal With Chin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ly 10, 1989.
28. Th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0, 1989.
29. Th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11, 1989.
30. 同註七
31.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一日。
32. 信報(香港)，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七日。
33. 人民日報，一九九〇年二月五日。
34.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ne 29, 1989.
35. 丁：「國際關係中的不干涉內政原則」，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八九年七月廿八日。
36. 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正確處理國與國關係的準則」，人民日報，一九八九年九月廿五日。
37. 李林林：「從鄭家華訪日看中國關係」，大公報(香港)，一九九〇年一月十七日。
38. Chang Qing, "China Foreign Minister Tours Africa", Being Review, August 28-Sept. 3, 1989, pp. 10-13.
39. 田紀雲說：「中國亦尋求進一步加強與世

界經濟連繫的途徑，爭取更加積極地參與國際經濟合作。中國正堅定不移地執行對外經濟政策，除已經設立的五個經濟特區外，我們還在沿海地區建立廣闊的開發地帶，積極引進外國資本、技術和人才，我們希望有更多外國企業、科技界人士成爲我們合作的伙伴。可以相信，外國的資本、技術和管理經驗，與中國獨特優勢相合作，不只會爲雙方帶來利益，而且將爲世界經濟，尤其是爲太平洋區域經濟繁榮注入新的活力。〔見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九年二月廿二日〕。

40. 這五點主張是：一、中東問題應通過政治途徑解決，各方都不訴諸武力。二、支持召開聯合國主持下有五個常任理事國和有關各方面參加的中東國際和平會議。三、支持中東有關各方進行他們認爲合適的各種形式的對話，包括巴解組織和以色列直接對話。四、以色列必須停止在佔領區對巴勒斯坦居民鎮壓，撤出佔領的阿拉伯領土，相應地以色列的安全也應得到保證。

五、巴勒斯坦國和以色列國相互承認，阿拉伯民族和猶太民族和平共處。見中國時報（台北市），一九八九年十月六日。

41. 去年十一月，李鵬訪問尼泊爾及巴基斯坦，都同意給予該兩國經濟援助。

42. 一九八八年十月，李鵬在曼谷宣佈中共對東盟的四原則是：第一、在國家關係中，嚴格遵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共和東盟各國雖然社會制度不同，但這不應影響彼此間建立和發展真正睦鄰友好關係。事實證明，決定國家的好壞並不取決於社會制度的異同，而在於能否嚴格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國將堅定不移地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爲同東盟各國建立恢復和進一步發展關係的政治基礎。

第二、在任何情況下，都堅持反對霸權主義的原則。中國現在和未來都決不稱霸，也反對任何謀求霸權的企圖，中國在本地區不謀求自己的勢力範圍，不以任何方式干涉別國內政，對於國與國之間某些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我們願意通過友好協商加以解決。

第三、在經濟關係中，堅持平等互利和共同發展的原則。中國和東盟各國都是發展中國家，雖然國情不同，經濟發展和技術水平也有差異，但彼此各有優勢，需要取長補短、互通有無、互相補充，中國努力加強與東盟各國在經濟、貿易和科技領域的合作，中國希望與東盟各國發展成爲重要的經濟合作伙伴。

第四、在國際事務中，遵行獨立自主、互相尊重、密切合作、相互支持的原則。我們高興地看到，在當今的世界上由少數國家主宰世界事務的時代已經過時，東盟等區域組織在國際舞台上正日益發揮著重要作用，中國將一如既往支持東盟爲維護地區和平和加強區域經濟合作所作的努力，支持東盟關於建立東南亞和平、自由和中立區的主張。見香港大公報，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人文及社會科學文庫）

政治心理形成與政治參與行爲

林嘉誠 著

一七一元

本書包括兩大部分：第一，政治社會化與政治權力取向；第二，政治態度與政治參與行爲。政治社會化與政治權力取向部分，除了說明相關理論之外，並實證調查了解政治社會化過程，各種政治權力取向。政治態度與政治參與行爲部分，也是闡述有關理論及施測各種政治態度與政治參與行爲。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37號
郵政劃撥：000016511號
電話：三二六一八三二一、三二一五五三八
傳真：(02)371-0274